

从延安一路走来

何方自述

何方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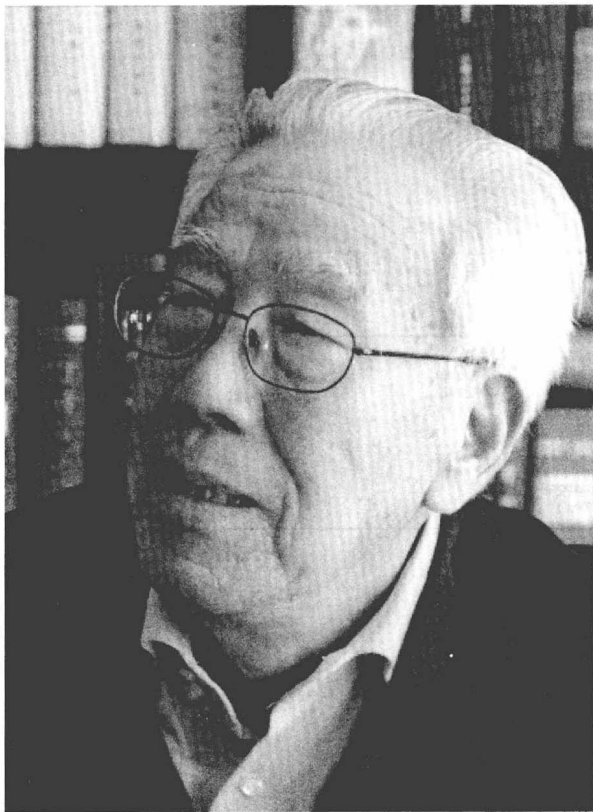


人民日报出版社

# 延安一路走来

## 何方自述

何方 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从延安一路走来：何方自述 / 何方著. —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5. 2

ISBN 978-7-5115-3019-6

I. ①从… II. ①何… III. ①何方—自传 IV. ①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09367号

书 名：从延安一路走来：何方自述

作 者：何 方

---

出 版 人：董 伟

责任编辑：陈 红

特约编辑：刘火雄

封面设计：李默凡

---

出版发行：人民日报出版社

社 址：北京金台西路2号

邮政编码：100733

发行热线：(010) 65369509 65369527 65369846 65363528

邮购热线：(010) 65369530 65363527

编辑热线：(010) 65369844

网 址：[www.peopledaily.com](http://www.peopledaily.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鑫瑞兴印刷有限公司

---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字 数：330千字

印 张：26.25

印 次：2015年11月第1版 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

---

书 号：ISBN 978-7-5115-3019-6

定 价：49.80元

## | 前 言 |

## | Qianyan |

我原来并没有想过写自传之类的东西。一个小人物，也没什么传奇经历，有什么可写的？但是一个偶然的机，却被两位倡导并实践口述历史的年轻朋友丁东、邢小群夫妇给说服了。所以能有这部书，完全应该归功和感谢他们，特别是小群。她为了来我家采访，可说是“带病出征”（她有腰疼的毛病），先后跑了二三十趟，有好多次都是大汗淋漓，气喘吁吁，着实令人感动。后来她又先后整理成二三十万字材料给我送来，真是费力费时不少！恰逢我已写完《党史笔记》，也就可以专门来处理这个自传材料了，于是就着手改写。由于过去长期写政论体裁文字养成的习惯，还把小群重视的生动、口语化、多写细节以及对话等，基本给改掉了。请教丁东，这样行不行？他说，没关系，反正各人有各人的特点。他还拿出去分别给几个刊物先行发表了几章。由于实在不像口述，后来商量干脆改名《自述》，反正意思是一样的。

我改变初衷同意写自传，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清理一下这辈子的思想，做点自我解剖，看自己是怎样从一个单纯的少年很快就

变得有点儿世故，学会说假话，连胆子也变小了。例如当我头一回和十多个同学去延安的时候，途中遭国民党扣押，我们就敢和他们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批评他们专制独裁，公开说我们去延安就是为了追求自由民主，表示士可杀志不可夺。经过一个多月的斗争，看来释放无望，还真敢冒生命危险翻墙逃出，二上延安。那时还不到十六岁。想看看自己是怎样变化的，又是怎样在革命的熔炉里被锻炼和改造的，这还真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我当然算不上典型，但一滴水也可照见太阳，从我这七十多年的经历中总能多少看到一点正反两方面的教训。可以设想，假若大家无论是在对敌斗争还是内部斗争中，都能做到“坚持真理”，始终保持为真理献身的精神，不信神，不怕鬼，推己及人，我想一切整人的政治运动肯定都搞不起来，那中国会是什么样子？一定早已成为自由、民主、文明、富强和站立在世界前列的大国。

其次，当年参加革命时怀抱的崇高理想就是为自由民主奋斗，喊的口号中有“不自由毋宁死！”，唱的歌也是“我们为了博爱、平等、自由，不惜任何的代价，甚至我们的头颅”。可是后来不知怎么搞的，这个理想竟然渐渐地淡忘了。是当年选的理想错了（因为那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东西，是反动的），还是后来背叛了当年的理想（因为自由、民主、博爱、平等这些东西属于人类共同理想，不分什么资产阶级的还是无产阶级的）？难道这些问题不值得认真地反思？人到暮年，再不好好想想，以后可就连想的时间也没有了。

再则，七十多年的革命生涯，我一直受到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党的领导等这些重大原则的指导、规范和约束。以自己的经历来说，虽然有不少行为是被迫的和随大流的，但总体上说来还是基于对这些重大原则自觉自愿地皈依和遵守。所以过去无论是平时还是遇到什么问题，都会联系考虑到这些重大原则。有时想得通，有

时想不通，而且越到后来想不通的情况越多。现在谈自己的一生经历，当然联想就更多了，我也把到现在为止的一些想法写出来。但是由于问题太大，自己的水平太低，写了好多遍，所谓几易其稿，还是说不清楚。

末了，还有几个具体问题需要做点说明。

第一，本书一概没有列出注解。因为一开始是作为“口述自传”写的，没有以学术著作对待。口述哪能带着书本或者数据，不是随口说就行了吗？后来校改时发现一些引证应当查清，但觉得这都是些人们熟知的話，何必注明出处？由于我一直研究国际问题，谈中国的事总习惯于放在当时的国际背景下，特别是喜欢和别的国家作横向比较，所谓用事实说话，用数据说话。这就不能不引证一些数字。我的处理办法是：凡普遍用的，估计属于人所共知的，就省略了说明来历；稍微生疏的，则尽量在行文中做点交代。

第二，本书几乎没有带引号的谈话。因为无论是我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谈的，我都不大可能记得原话，顶多记个大意。有些连大意也没记住，而只有个模糊印象，那就只好不提了。我看过一些有大段大段带引号的对话的回忆录、口述自传和传记，我以为那只能是十之八九以传主为模特儿写的小说和编的故事。在时隔久远，既无录音、又无速记的情况下，编的越具体就越不真实。有人说，这是学《史记》的写法。但《史记》除了“史家之绝唱”一面外，还有“无韵之离骚”一面，而且互相矛盾和夸张不实之处确实很多。所以史学家唐德刚就认为《史记》不是历史，而是小说，并以吕不韦、嫪毐等为例。

第三，我的自述很难做到具体还有一个特殊原因，就是个人没能保存有关自己的材料。我本来从小就有个记日记的习惯，写的还比较详细。可是后来在政治运动中，不但变成麻烦，还被收缴后

永不归还。于是下定决心，从此不再写日记了。其后在工作中，总有些事不能不记，结果又形成数十本的“工作笔记”。然而，1959年“反右倾”，被有选择地收去部分材料，其余“工作笔记”和一些别的材料，又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全部抄走，而且也是有去无回。所以这次写自述就只能主要靠回忆。有时乍一看，年月日还写得很具体，但大部分是从别人的资料中抄下来的，如《张闻天年谱》《周恩来年谱》等。因为跟他们工作，时间总是在一起的。不过应该指出，虽然缺乏个人资料，但对个人过去的经历并没有任何瞎编之处。因为我有一个原则，就是凡记不清也查不实的事情，就坚决舍去不写。

最后，我每写一章都要打印出来送请一些熟悉的朋友和过去一起学习或工作过的同志审阅校正。除几位老友，如萧扬从头到尾做了审阅并随时提出阅后意见外，大部分则是只请有关时期的同学同志给阅提意见，如延安同学、东北工作时的警卫员赵守先，困难时期下放劳动时住过的房东袁世银等。对他们以及在本书写作过程中给予过帮助的同志，我都表示深切的谢意。

在此，谨向《日本学刊》编辑部主任林昶小友，本书责任编辑陈红女士、特约编辑刘火雄先生致以诚挚谢意。

何方

## |目 录 Mulu|——

## 第一章 少年时代（1922—1937年）

我们村叫高家庄，不但在县城边，离西安市中心也只有25公里。中国的东西通道陇海铁路又从我村旁过。按理，那里应该是早就开化了。但实际上却落后得一塌糊涂，在经济文化上是真正的穷乡僻壤。到我七八岁时才通火车。车站离我家只有一二里路。一开始，老百姓都没见过火车。第一次火车开来的时候，附近村庄就来了好多人看热闹。由于不知道是个什么玩意儿，心情有点紧张。火车也好像故意吓人，老远就已扑哧扑哧地大声响。人们本来就已越来越紧张，不料这火车到跟前又突然“呜”地这



么一叫，上面冒青烟，下面喘大气，霎时间一些人吓得当场摔倒，坐到了地上。

（一）改名换姓：学鲁迅、丁玲随母姓 / 002

（二）家住临潼：从女娲“炼石补天”到“西安事变” / 003

（三）我的家庭：祖祖辈辈靠种地为生 / 007

（四）童年往事：四五岁时开始挖野菜、割草 / 017

（五）偶尔上学：学了《百家姓》《三字经》《弟子规》  
《四书》 / 021

（六）走向革命：开始读马克思、列宁的文章 / 028

（七）奔赴延安：得自己筹集路费 / 032

## 第二章 延安岁月（1938—1945年）

在延安的生活中，给人一个很重要的感受，就是觉得人和人是平等的。那时一切机关学校都是军事化组织，不但有上下级之分，而且强调的也是厉行服从。但是并不觉得谁拥有不正当的特权，或者有权就可以欺负人，而是确实认为上下级只是分工不同，在政治上还是平等的，上下级关系没隔阂。开大会时，首长坐在主席台上或演出时坐在前排，大家觉得应该。有的首长来晚了，前边还有人自动给让位。有的首长干脆坐在后面的人堆里，和大家一起，也不会有人觉得奇怪。最盛行的是请首长题字签名。开会时队列不能乱，但只要一散会，一些人就掏出本子拿出笔请首长题字签名了。我就多次看到毛主席一边走一边给人题字，只是简单地写“前进”、“奋斗”、“努力”等字样，直到走出会场外上马为止。还有一次，我亲眼看到陈云进延安城北门被站岗的挡住，问他是哪部分的，为什么不系风纪扣。陈云规规矩矩地扣上风纪扣才让进去。

- (一) 进入抗大：一面学习，一面种地 / 040
- (二) 紧张学习：当助教后拼命读书 / 047
- (三) 整风前的延安生活：歌声遍地，自由平等 / 056
- (四) 劳动生产：“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 071
- (五) 延安整风：“是王实味挂帅，还是马克思挂帅” / 076
- (六) 抢救运动：一时被迫承认自己是“复兴社”成员 / 080
- (七) 告别延安：急于离去，“没打算活过二十五岁” / 089

### 第三章 东北四年（1945—1950年）

经张闻天夫人刘英介绍，我先和北上的干部队取得联系。一打听，好家伙，原来这个队都是些高干：有去北满分局的高岗、张闻天，去西满分局的李富春，再就是配备给北满和西满等省的省委书记、省长和军区司令员等。记得的有：王鹤寿、方强、李大章、张策、彭敏等，当然还有刘英。我在里面，只能算个小萝卜头了。我一想，人家有好几个高干都没带警卫员，我还带什么警卫员，于是就联系把他留在沈阳工作，自己只身跟上干部队北上了。

- (一) 到东北去：和张闻天、高岗同乘一节闷罐车 / 094
- (二) 双城工作：提前缴了保安队的枪械 / 108
- (三) 南下土改：接受张闻天领导 / 121

### 第四章 在驻苏使馆（1950—1955年）

当了四年研究室主任，究竟写了多少文章，我自己也闹不清楚。一天到晚地工作，除了写就是看。办公时间只能看调研材料，业余时间也看些杂书。每逢星期天，多半是跟张闻天上书店。张

闻天烟酒不沾，没有什么嗜好，买书似乎成了他的唯一嗜好。刘英喜欢逛商店，不喜欢跑书店，所以张闻天就以拉上我的时候居多。往往一到星期天，他喊一声：“何方，走，上书店！”我们就出发了。张闻天买书的范围之广，着实惊人。从政治理论到各种通俗读物，什么土壤学呀，物候学呀，直到一些中小学课本，他都买，而且买来真看，起码浏览。我也跟着学。我的一些中文书，从马列著作到“三言”“二拍”之类，就是在莫斯科买的。我喜欢买书和藏书，一定程度上是受了张闻天的影响。当然，一些交际活动我也参加。例如，我给一些学跳舞的人吹牛说，我曾和世界上最有名的舞蹈家乌兰诺娃、列别申斯卡娅、崔承喜跳过舞，使她们羡慕不已。

- （一）待命驻联合国代表团：等了一年零两个月 / 142
- （二）跟张闻天赴苏：使馆面貌完全改观 / 145
- （三）当研究室主任：研究报告受到周恩来重视 / 150
- （四）随张闻天回国述职：给我创造条件解决婚姻问题 / 154
- （五）参加日内瓦会议：代表团众生相 / 158
- （六）离苏回国：自费参观列宁格勒 / 165

## 第五章 跟张闻天回到外交部（1955—1959年）

我上班之后被安排的第一件事，就是看文件、电报以及其他有关材料。凡是送给张闻天的材料，政治局的、书记处的、中央各部委的，更不要说外交部各单位和驻外使馆的，都由我先看一遍，挑出需要送张闻天阅的，对有些文电还在旁边批注点个人看法或处理意见。凡送经张闻天审批上呈、会签以及发表的文件，他也要我先看一下，该修改的就修改，不能用的可以直接退还给原来的起草单位请他们另拟。有些须报经他同意，有些就由我自行处理，否则他会说：你连

这点事都办不了。这就在实际上使我处于把头道关的地位。

- (一) 坐上“特别快车”：成了张闻天的“秘书” / 172
- (二) 编《每周通报》等内部报刊：毛泽东也经常看 / 181
- (三) 起草修改文件：张闻天一般不征引毛泽东语录 / 184
- (四) 跟张闻天视察驻外使馆：“请何主任给大家作报告” / 191
- (五) 外交部的运动：因埋头业务，做了旁观者 / 194
- (六) 张闻天的外交工作作风：与周恩来、陈毅的异同 / 201

## 第六章 祸从天降的反右倾（1959—1960年）

批判张闻天的外事会议一开始，我就发现自己对这场斗争的认识和思想准备实在差得太远了。庐山会议后张闻天回到了家，我当天晚饭后就去看他，还陪他们夫妇在院子里散了一阵步。谈话也显得有点轻松，看来连张闻天本人都没想到会有后来那么严重。他还是和过去一样，说起话来笑眯眯地。他表示，以后不让做这种行政工作也就算了，研究研究国际问题来安度晚年也好。甚至还谈到以后不再跳舞了，说是你们要戒烟，我要“戒舞”。张本人确无其他嗜好，唯对跳舞有点兴趣。

- (一) 卷地而来的反右倾风暴：被迫同张闻天划清界限，表明“坚决跟毛主席走” / 210
- (二) 对我的批斗：批判我追随张闻天“反总理” / 219

## 第七章 饥饿线上挣扎的一年（1960年）

不但没吃的，有时更严重的是没烧的。有几次因为没柴烧而断炊一两天。我除上厕所外就一直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地闭目养神，思前

想后，背诵诗词，也多次念叨屈原的句子：“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这说明脑子还在动，但全身已毫无气力。例如一次不留神躺在了一把镰刀上，硌得腰背生疼。于是展开了思想斗争：是拿开它，还是移动身子躲开它，还是忍痛让它硌着去。斗争了很长时间也没动弹，因为前两项多少总得用点力气。好在这种断炊的日子并不太多，更没持续多久，支部和生产队总会想办法。有几次就是动员各家献出能当柴烧的家具。就这样，每次危机都还是勉强度过了。

(一) 下放安徽：一个油炸萝卜丝素丸子要卖一块钱 / 224

(二) 农村情景：鸡犬不相闻，死一般寂静 / 229

(三) “跃进”种种：“村村点火，处处冒烟” / 233

(四) 下放生活点滴：一天吃了四十多斤萝卜 / 238

(五) 告别安徽：从来没见过人们这么木然 / 241

## 第八章 “文革”前五年（1961—1965年）

后来作总结时，我已取得县委的完全信任，以至于起草以昌黎县委和“四清”分团的名义给省地委的总结报告时，可以采取流水作业的办法。当时县委住在一个四合院里，正房三大间“一明两暗”，中间为堂屋，两边是带炕的两大间寝室。县委在左边的屋里开会，炕上炕下坐了十多个人。我一个人在右边起草。写好一张，由秘书拿到左屋去念，念完大家议论议论，或扯些其他闲话。有时王家树也叫秘书：“去看老何下边一张写完没有？”就这样，从早到晚，一份七八千字的关于团林也是昌黎第二期“四清”工作总结报告，写完并经县委（也是分团委）一字未改地讨论通过，打印上报了。

(一) 调理身体：打下好几十条蛔虫 / 246

(二) 出任综合组组长：“你装什么蒜，见了人都不理” / 251

(三) 甄别和轮训：我没有任何反对三面红旗的言行 / 252

(四) 参加“四清”：“三农问题”早已存在 / 256

## 第九章 卷入“文化大革命”（1966—1968年）

从宣布隔离之日起，规定我除随时接受审查和批判、两个星期写一次思想汇报以及他们要的其他材料以外，唯一的工作就是每天上班后打扫老部新楼大约二十来个女厕所。男厕所归同屋的王凝。花的时间都是一两个钟头。其余时间完全由自己支配，主要是看允许看的书和搜集到的传单小报。我们两人一切自律，按时上下班，有事外出都会请假。我们的活动始终没有人看管和检查，完全靠自觉。儒家所提倡的“慎独”，这点我们都确实做到了。

(一) 一回到北京就成了牛鬼蛇神 / 268

(二) 抄家与破四旧 / 269

(三) 在被隔离的日子里：每天上班打扫二十来个女厕所 / 273

## 第十章 九年干校生涯（1969—1978年）

在解决好饲料和疾病防疫问题后，我开始训练猪听指挥和上厕所。听指挥，就是按我的口令离圈出去到放牧地吃草和听命全部回圈。其实办法很简单，就是用猪最喜欢吃的空心菜作诱饵，先从两头用作带头的猪训练起，喊话后赶它们回来吃空心菜。用不了多长时间，猪们就听话了。听到我的喊声，它们先是竖起耳朵辨别真假，听准后就撒腿往回跑，争吃空心菜。我的两个儿子来探亲，觉得好玩，也喊话叫猪回来，大概是口音的关系，怎么喊，猪也不理。

(一) 干校探源：从毛主席的批示说起 / 282

(二) 凄凉上千校：训练猪听指挥回圈和上厕所 / 283

(三) 干校的后五年：开除党籍受沉重打击 / 294

## 第十一章 20年冤案得到平反（1978—1979年）

我也是有备而来，看完结论后表示完全不能接受，并阐述了理由。朱霖她们提出要我把意见写出来由他们转交党组。我说，我知道这是你们结案的一种办法，把本人意见附在后面，决定就算生效了。因此我不会写一个字，只是请求你们把我的意见报告党组。如果党组坚持原有决定，那我就要求将我的问题提交中组部审理。由于她们也不打算说服我，对我的问题又不十分清楚，所以双方没有辩论就结束了第一次谈话。

(一) 等候复查：又先后学起了英文和日文 / 310

(二) 复查的交锋：最终在《审改决定》上签了字 / 312

## 第十二章 恢复工作（1978—1979年）

1979年5月，曾彦修、徐达深和我接到通知，要为中央领导同志（后定为邓小平）起草在张闻天追悼会上宣读的悼词。这件工作对我们三个人来说都感到棘手。我们不但很难掌握对张闻天的评价，而且连他的历史都不了解。因为他这个人有个特点，就是从来不对我们这些人谈他的过去，更不用说做过什么贡献了。写悼词简直无从下手。我们除了拜访刘英以及其他能见到的老同志外，还得经过批准去中组部查阅档案。

- (一) 离开外交部：转入中国社会科学院 / 316
- (二) 为张闻天平反：参与起草悼词 / 317
- (三) 中央国际问题写作小组：住进了江青使用过的小套间 / 325
- (四) 筹建国际片：效仿“刘备借荆州”巧要地 / 335

### 第十三章 日本研究所（1980—1988年）

对日本所，我着重抓学风建设，希图建立一种好的风气和传统。我们相约，在做学问和做人上，应当把做人放在第一位。古今中外的学问家，大多是道德高尚、品学兼优的人。同时，要做学问，就必须刻苦学习，不仅要专，而且要博，抓紧一切时间充实自己、积累知识。做研究工作还得有不计名利、甘心坐冷板凳的精神。无论是做人、还是学习和工作，特别是科研工作，我以为都应该以马克思为榜样，因此规定《回忆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日本所新来人员的必读书。我们还提倡发扬独立思考和创新精神，提出没有新意的文章不写，没有独立见解的言论不发表，坚决反对那种缺乏个人研究只是东拼西凑赶时髦的所谓科研成果，并反对各种形式的剽窃。

- (一) 受命筹建：不攀领导、不走后门 / 340
- (二) 学科建设：着重抓日本经济的研究 / 347
- (三) 全国规划和学术交流：代表团访问日本 / 352
- (四) 我的研究工作：从来没请过他人代我起草稿件 / 364
- (五) 离开日本所：转入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 370

### 第十四章 国研中心（1988—1995年）

这七年的工作，是名副其实地在搞调研，而且主要是自己研究，



对大家的研究管得不多，无非是定题目、改文章，提点意见。在这期间，我曾给定居国外的邻居回过一次信，用顺口溜来描述我一天到晚的工作和活动，就是：“看不完的材料，开不完的会，写不完的文章，受不完的罪。”确实也是，搞这种研究工作或文字工作，一直都处于紧张状态，单是这看材料就真是没完没了，书籍、报刊、公开的和内部的材料，每天一大摞，不看也得看，耽误了还得补看。至于写点有新意的文章，就更不像一些诗人和作家有了灵感激情能够一泻千里那样轻松愉快了。我在这七年期间写的内部报告和公开文章，长有几万字，短只几百字，加起来也不过百篇左右。

（一）岗位变了：还挂名北京大学兼职教授 / 374

（二）科研工作：创办“政策建议”短小报告 / 378

（三）离开国研中心：1999年77岁时办离休手续 / 384

## 第十五章 离休以后（1999年至今）

每个人都有梦想，尽管已过耄耋之年，我依然相信我们的国家会更繁荣昌盛，生产力高度发展，产品有极大丰富，人民不仅可以过上丰衣足食、共同富裕的生活，还能够享受到人类多年来追求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公平、正义、和谐、幸福。每念及此，也算是我们这一辈人参加革命数十年的奋斗没有白费。

（一）改行学习党史：希望留下点历史资料 / 390

（二）“自传”从口述变手写：力求表达准确，保持个人文风 / 393

附录 何老印象（邢小群） / 401